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四一二期 ——
(二〇〇五年一月十一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501b)

【史海钩沉】“沙甸事件”概述	马绍美
【往事追忆】无辜的反动学生 难忘的农村岁月	文贯中
【往事如烟】重庆文革口述史——黄廉访谈录(八)	老田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www.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hwxz@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史海钩沉】

“沙甸事件”概述

• 马绍美 •

〔博讯记者老农与该回忆录的作者马绍美，以及沙甸事件反抗组织者马伯华的弟弟马伯灿都曾经在云南省第二监狱服刑，对这二位回族受难者的人格极为敬佩。也因为他们对笔者的信任和友谊，笔者才有机会了解那场惨绝人寰的沙甸惨案。〕

现在马伯灿仍然在服刑，一段时间曾经有 6 名犯人 24 小时实行特级严管。其判刑原因并非他已经犯了什么事，而是为了防患于未然，在 92 年平远街事件前先把这个“回民英雄”的弟弟抓起来，以降低回民的抵抗能力。

英俊、潇洒、仗义的马绍美在 93 年出狱 2 年后在一次车祸中为救一位素不相识的路人撒手归天。留下他美丽的妻子终日以泪洗面。

看到“黄花岗”杂志按中共一面之词对沙甸事件的定性，我感到有责任将此事公之于天下。下面我将把马绍美的沙甸事件回忆录重登出来，以作为历史的见证。——老农）

“十年文革”酿成了“沙甸事件”。“沙甸事件”给沙甸人带来的损失是惨重的。这个损失比较起整个国家“十年浩劫”中的损失来虽不算大，但它记下了我们党在“十年文革”中对少数民族问题、宗教问题采取的左的态度以至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造成了回家重大的损失，有着极鲜明的代表性。“十年文革中的沙甸”可谓我国“十年文革”的缩影和写照。

一九六七年轰轰烈烈的“革命风暴”席卷着满天的传单、大字报以及人们莫衷一是的心情来到沙甸。这是毛泽东同志发动的。耿直的沙甸回民当然热烈响应。丢了锄头、镰刀、扁担、谷箩，举起纸裱的小红旗，成立了毛泽东思想的“造反队”、“战斗队”、“兵团”。听上边说清真寺在被扫的“四旧”之列，于是，几个人带领鼓动，部分群众拿出了“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疯狂地烧起宗教经典和“地富反坏右”家的书籍来。那气势，若秦始皇在世也是要自叹不如的。

“毛泽东思想大无畏造反兵团”、“毛泽东思想红色造反队”冲击关闭了清真寺。

沙甸最能显示力量的“民族政策捍卫兵团”站出来，“红旗野战兵团”也站了出来。

一场争夺清真寺的斗争展开了。

拉锯争夺清真寺越演越烈，沙甸马上成了“造反”与“捍卫”，“革命”与“复辟”的勇士们的用武之地——开始武斗，刀枪相见。

大家都把自己的知识、谋略尽情地具体发挥，对自己的“敌人”要进行“革命的大扫除”了。

沙甸的“左派”人数不多，但靠山硬，去部队那里领了武器，带着其它地方的“左派”，来攻打“复辟”的沙甸。一九六八年七月，包围了沙甸，炮打烂了清真寺的屋顶和部分民房。双方都死了人，沙甸没被攻破。

一部分所谓站错队的其它民族的同志到沙甸避难。对沙甸就要“捅马蜂窝”。

六八年十一月，称为云南省革命委员会一、二号文件的宣传队（支左部队）包围了沙甸，并展开了舆论攻势。

“一小撮阶级敌人、牛鬼蛇神、野心家、阴谋家受国民党军统特务指使，煽阴风，点鬼火，欺骗群众，蒙蔽群众，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他们必将碰得头破血流！”

“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没有好下场！”

“谁胆敢放一枪一弹就坚决镇压！”

“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

.....

在强有力的宣传攻势下，大家都把希望寄托在“宣传队”会很好执行党的政策上，于是把准备对抗的武器全部交了出去。六八年十二月八日，沙甸回民夹道欢迎宣传队（解放军）进村。

“宣传队”进驻清真寺。吃猪肉，猪骨头丢在水井里。

清理阶级队伍，“反军乱军黑干将”、“宗教复辟急先锋”、“跳梁小丑”、“小爬虫”抓起了两百多。对这些人专政，反复开斗争、批判大会，捆、梆、吊、打，有人在吊打中死去。强迫这些人学猪叫、学猪爬、学猪滚，有一孕妇滚得小产。

极左路线的推行者，要用“行动”来证明他们是“最最革命的”。狠狠打击信教者，正是左的革命表现。沙甸搞以教划线，礼拜、把斋者是批斗对象。公开宣布：“信教就是反对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就是反对共产党的领导”。

“抓革命、促生产”，沙甸的几百“牛鬼蛇神”抓出来了，生产“上去了”，学大寨的标兵生产队每个劳动日值8角，其它生产队还在2角、3角、4角中徘徊。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九个生产队都评政治工分，政治思想好的人工分就多，否则就少。

在艰苦漫长的岁月里生存发展起来的回回民族，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宗教感情，团结力最坚，斗争性最强，有优良的传统、有光辉的文化遗产，能够接受真理、激起正义，不能接受对自己的侮辱与糟蹋。

为了维护党纪国法的尊严，为了维护回回民族的尊严，为了得到正当的生存权利，保持自己的风俗习惯、信仰自由，一九七三年十月，在马伯华等同志带领下，以开放清真寺为起点，沙甸等地回民拉开了与“四人帮”针锋相对斗争的序幕。

开放清真寺被说成是“宗教复辟”，州县工作队进村，调子更进一步：“民族斗争说到底就是阶级斗争……”。

回民的宗教就是伊斯兰教，而复辟就是被镇压了的东西东山再起。大家知道共产党有一条“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却没有听说过伊斯兰教被镇压了。

“批林批孔”，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的工作队在坚定不移地进行斗争，群众始终没被压下去。

过开斋节被说成“反革命集会”，进行武装阻拦未奏效。

拉锯争夺清真寺越演越烈，群众始终占上风……

一九七四年五月底，蒙自县公安局抓马绍美，因此群众包围了工作队驻地，强烈要求放人。工作队却卷起行李溜了。

一九七四年八月，周兴到沙甸，承认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还存在，答复可以清查生产队的经济帐目。周兴离开沙甸，前言尽否，“黑帐”依旧……

一九七四年十月，沙甸等地回民上访（昆明）要求落实政策，要求解决在少数民族地方存在的经济、民族、宗教方面的问题。

“这是闹事”。“这是反对党的领导”。“四人帮”、周兴等人是会做帽子的。

鸡街地区成立了“民兵联合指挥部”。民兵进行示威，用大字报“揭露”沙甸“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披着宗教外衣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

帽子太大了是戴不稳的。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初，沙甸成立“回民民兵团”。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中旬，当时的云南省常委一要员到沙甸，鸡街民兵联合指挥部的民兵借口保驾包围沙甸，荷枪实弹，进行威胁。沙甸回民不甘受辱，徒手夺枪两支，但也付出了死

亡一人、重伤三人的巨大代价。对方民兵虽被回民俘虏七人，都得到回民的优待，教育后而放归。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七日至二十三日，沙甸落实政策宣传队发动了建水县回龙、馆驿、麻栗树等地回民开放了他们的清真寺。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沙甸回民民兵前往建水解救回龙被对方民兵包围一事。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沙甸回民在要求蒙自县委落实政策、解决问题未果情况下冲击了县委机关和县武装部，被对方民兵骗到蒙自二中，打死我十四人，重伤十六人，回民一怒之下，攻下对方，击毙其十二人。

一九七五年元月一日，中央通知马伯华、郑全书、马绍美等回民代表十人与云南省委一起赴京解决问题。做了两天的思想工作后，元月三日晚，回民代表与省委常委一起，乘坐国务院派来的专机抵达北京。

一九七五年元月上旬，贯彻中共中央一九七五二号文件，即关于浙江、云南停止武斗，收缴武器的通知。云南省委为贯彻此文件，专门成立了云南收缴枪支执行小组，由十四军当时的政治部主任冯治国任组长，蒙自军分区当时的司令员李凤刚和沙甸的马绍美任副组长，开远、建水当时的县委书记邓子俊、黄昌岐以及回民代表马先庆、马恩俊任组员。这个组的分工是：马绍美、马先庆、马恩俊收缴回民方面的武器，冯治国等收缴其他民族的武器。半个月时间，沙甸等地回民上缴了全部枪支弹药。据冯治国等几个说其他民族的也缴清了。执行小组回北京汇报。

一九七五年二月中旬，建水县馆驿等村回民集中到回族村子——双山做圣节。

香木桥大队肖家庄的民兵持枪前往威胁挑衅，做节的回民在惊怒之下欲夺其枪，未成，反被打死九人。引起了在二月下旬沙甸等地回民的第二次赴昆上访。

三月五日王洪文令驻玉溪的部队包围交开炮轰击玉溪西营清真寺。玉溪昆明等地开始抓捕“闹事”的回民头头。沙甸空气紧张，人心惶惶。

住北京的周兴等人得意忘形，向住北京的回民代表声称：“这次到北京是一次重新‘站队’难得的‘机会’，年轻人，前途无量，要好好考虑啊！”回民代表没买帐。

五月初，几个团的部队要进驻沙甸，群众怕重吃一九六八年部队进村后的亏，竭力阻拦进村，因此部队未进成。

五月二十三日，周兴等人以云南省委的名义发了“通告”，并用飞机到沙甸上空散发。“通告”把回民群众要求落实政策说成是被“反动教长”和“反革命分子”煽动起来的“闹事”，几个回民头头是违法的，只有放下武器（其实没有武器），迎接解放军进村，才是唯一出路。

回民群众义愤填膺，几千份“通告”一下就被集中成几大麻袋，小伙子们簇拥着扛到工作队驻地——鸡街糖厂的大门口，一把火烧了。

谣言漫天，污蔑、诬告回民的黑材料不断送上北京。

当时红河州的一个主要帮派人物说：“现在回民就象一头疯牛，我们要把她（他）引入火坑。”

七月中旬，“四人帮”及云南的周兴等人命令回民代表回沙甸做工作，交出武器，（特别强调交出新式武器）和欢迎部队进村。

没有什么新式武器，当然也就无法交出。关于自制的土武器，大家表示在接受群众的条件后就交。条件即：欢迎少而精的部队进村落实政策。沙甸这么一个村子，怎能容纳几个团的部队？解放沙甸时，对付国民党的一个团只需要一连的解放军，今天到沙甸落实政策却要进驻几个团的部队，要搞什么呢？六八年部队进村的教训，大家记忆犹新……

群众坚持只欢迎少数部队进村落实政策的意见。

“四人帮”及其一伙欺骗的伎俩用完了，最后，无耻地给沙甸等地回民扣上“与苏修、敌特挂钩，要成立伊斯兰共和国、要叛乱、有地道、有新式武器”的政治罪名。险恶用心，昭然若揭。可惜回回太幼稚、耿直，知道得太晚了。

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九日凌晨三点，“四人帮”开始对沙甸回民武装镇压。村边站岗的回民兵，被手脚捆起来丢到粪池中溺死；沙甸父老被枪炮声惊醒；大清真寺的守卫者殉难；沙甸大清真寺被武装人员占领。

凌晨四点多，沙甸回民凭据地形熟，进行反攻。付出上百人殉教的巨大代价，夺回了。大清真寺，始得到一点现代武器的装备。此时，西营（注：老沙甸西部村名称谓）已被武装人员占领，后山、马家井、林家巷、金鸡寨、川方寨的部分生产队场院及民房也被武装人员控制，于是，在这黎明前的黑暗里，街战、巷战、以住房为据点的攻守战在残酷地进行着，在火箭筒的爆炸声、火光里，在枪炮的呼啸声中回民一片片倒下。沙甸人没有屈服。到天亮时，又收复了部分民房据点，收回几间自己的房屋，又付出几百条宝贵生命的代价。更为凄惨者，没抵抗的回回们——

有的被打死在堂屋（回话会客室）中，有的被击毙于门旁，甚至有的被枪杀于床上；有的指望逃生，愿意当俘虏被押出村去，却在押送途中被枪击于路旁的光天化日之下……

群情震怒，凭据用无数生命换来的那几支步枪、机枪、手榴弹，以及那些自制的土武器奋起抵抗。有多少本不想抵抗的人，最后也含酸忍泪拿起那点土炸药去寻同归于尽的对象。然而真正找到同归于尽的对象的并不多，自己反而丧生的却不少。

炮火越来越猛烈。中午，三所清真寺开始被炮击，哪里的房屋坚固哪里被炮击。哪里出现炊烟哪里被炮击，哪里有水井哪里就被火力封锁。无须说明，大家都清楚了，这是沙甸穆斯林的灭顶之灾。于是，以安拉的考验、以乐园的恩典、以回回民族的气节相互安慰着、鼓励着、遗嘱着……此时，望生哪有生之路，望存哪有存之地？

二十九日入夜，炮火有所减弱。但只要哪里房屋透出光亮，随着炮弹就划破黑暗，呼啸着在哪里爆炸，于是惨痛的呻吟声、幼儿被惊吓的哭声……撕肝裂肺。黑夜，为何这般漫长！你要吞噬多少人的生命和鲜血啊！

三十日，进攻的武装人员放弃对老沙甸村内的部分控制点，缩小村外包围圈，占领制高点及有利地形，在无线电报话员的指挥下，对老沙甸村子进行更猛烈的轰击，火焰喷射器也用上，

老沙甸成了一片火海。金鸡寨、川方寨炮火稍逊。下午，老沙甸部分群众陆续撤到金鸡寨。入夜，马伯华带领部分群众也撤到金鸡寨。通过商议，决定做群众的思想工作，出村逃生，身体健康者可设法转移。

三十一日，通过反复劝说，二千余老弱妇幼、伤残病的回民群众在笔者的带领下集队出村，以求生存。出村的群众马上被分住几个小集中营办学习班，笔者等头头银铛入狱。入夜，突围转移未成，在川方寨发生遭遇战，伤亡惨重，马伯华脚被手榴弹炸伤，只好撤回金鸡寨。

八月一、二日这两昼两夜中，金鸡寨、川方寨两村的房屋据点争夺战从未间断。一方是拥有现代化武器装备，一方仅凭精神；一方是训练有素的武装人员，一方是普普通通的平民百姓，怎样拚呀！在炮火硝烟迷漫中，在血洗之后，老沙甸与川方寨已没有抵抗力量了。

八月三日，金鸡寨已被进攻人员控制一半左右，争夺、拼搏仍在进行。炮火依然未断。在已被进攻人员控制的地段，残酷的“清剿”在继续，伤残的“回匪俘虏”被提着脚手，象丢死羊一样丢上汽车，运去“医治”，而有的干脆在现场补枪，来个“快性”。

八月四日，一百五十七名男女老幼回族群众举着双手，集队从金鸡寨南面出村，指望求生。当走到大田埂上的时候，几挺机枪一齐开火，一分钟之后，尸横遍地，血流成渠，随即验尸，未亡者进行补枪。现有五名幸存者以为铁证，其中三名是补枪也未补死的。下午六时许，炮火摧毁了金鸡寨南面几间仅存的小民房，马伯华等同志壮烈殉难。入夜，又进行了最后的“清剿”，战斗始告结束。

这七天八夜，不知耗费了多少弹药。被摧毁的民房四千四百多间，被夺去生命的沙甸回民九百人，伤残六百余人，进剿者死伤人数不得而知。以参加“沙甸叛乱”的罪名遭到同样武装镇压的还有开远县的新寨、砚山县的车白泥、田心茂龙、松毛坡、文山的茂克等。整个事件中回民共死亡一千六百余人。“沙甸事件”惨绝人寰，在新中国的民族史上写上了最不光彩的一页。

中国共产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四人帮”被粉碎了。他们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罪行得到了应有的惩罚。真理胜利了！人民胜利了！沙甸回民又见到了社会主义的阳光。

一九七九年二月，中共云南省委、昆明军区党委联发了（79）7号文件，即“关于沙甸事件的平反通知”。文件指出：“一九六八年以来，由于谭甫仁、周兴推行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大搞以人划线、层层站队，支一派、压一派，严重分裂了各族干部群众，甚至采取了侮辱回民群众的错误做法，伤害了民族感情，破坏了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破坏了民族团结，引起了沙甸等地回族群众的强烈不满。问题发生后，一九七四年五月，中央作了正确指示，要周兴亲自处理，落实政策，周兴却坚持错误、采取一系列激化矛盾的错误做法，酿成了一九七五年七月沙甸事件，造成了严重后果。因此，沙甸事件并不是反革命叛乱，采取军事解决是错误的。经党中央批准，原定（以沙甸为中心的反革命武装叛乱）的结论应予撤销，这个事件中涉及的广大回族干部群众应予平反。”

中共云南省委民族工作部同时发了（79）1号文件。即“关于处理沙甸事件遗留问题的通知”。国家补助修建了七所清真寺。落实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

一九八〇年七月，省委民族工作部又发了（80）142号文件，即“关于沙甸事件平反善后经费的若干补充意见”。按照文件精神，红河州委、个旧市委处理了孤老、孤儿、半孤儿以及死难家属的抚恤救济问题、伤残人员的医疗补助问题。

全民所有制单位招收了二百名符合招工条件的孤儿及受害家属子女；沙甸划为经济作物区，吃国家返销粮。

一九七八年八月，针对云南省委、昆明军区党委联发（79）7号文件第3条留下的尾巴，云南省委发了（87）31号文件，即《关于撤销中共云南省委、中共昆明军区委员会联发（1997）7号文件中个别结论的通知》。

（87）31号文件指出：“……实践证明，这个文件〔（79）7号文件，笔者注〕总的正确的。在贯彻执行过程中，也发现文件第三条中关于“马伯华、马开志、郑全书、马绍美等几个人对抗中央指示，使矛盾激化，是有错误的。特别是他们成立非法秘密组织，妄图背叛祖国，搞打砸抢造成流血事件，破坏民族团结，是有确凿罪行的。但考虑到历史原因，马伯华、郑全书、马绍美可以不作为反革命分子对待。”这一结论不确，经过反复查证，其结果是：

一、关于“非法秘密组织”，是指“罕指奔位协”，它是在“文化大革命”不正常的历史条件下，少数人搞起来的一个宗教性组织，不应作为罪行。

二、关于“妄图背叛祖国”问题，查无实据。所谓背叛祖国的罪行不能成立，应予否定。

三、关于打砸抢问题，确实是存在的，打砸抢是错误的。鉴于“沙甸事件”这一特殊情况，不再追究。

据此，经请示中央同意，将联发（79）7号文件第三条结论，予以撤销。”

至此，“沙甸事件”完全、彻底平反了。这是党中央对广大回民的关怀。经受冰霜摧残的禾苗，最能感到阳光的温暖，深受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的沙甸穆斯林，最能体会党的恩情，同时，沙甸回民还知道，洗劫之后的祖国及家乡，文化、经济恢复发展的重任摆在我们面前。历史的经验使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安定团结。这样，我们才能为祖国的四化建设，为回回民族的文明富裕而奋斗。

□ 摘自《沙甸回族史料》，原载《博讯》网站

~~~~~

## 【往事追忆】

无辜的反动学生 难忘的农村岁月

• 文贯中 •

全上海持有反血统论观点的一派成立了中串会，我们中的一些人认为文革前的阶级路线也带有血统论的痕迹，市革委会并没有采取彻底的行动清算反动血统论。在这种认识的推动下，我们这派渐渐和市革委会对立起来。现在想来，我们当时十分幼稚。在四人帮统治的上海怎么可能做到真正清算血统论呢？但是我们当年十分执着地要求与我们对立的一派彻底放弃血统论，并要市革会站在我们的立场上。那个时候张春桥、姚文元已经掌握上海市革委会。他们希望我们不要再吵这种事情了，更不会支持批判党的阶级路线，因为这条路线恰恰是他们鼓吹的阶级斗争理论和不断革命理论的主要整人武器。于是我们就觉得当时正在批判张春桥、姚文元的大学生们是我们天然的同盟军，我们应该跟他们一起战斗。当然，以复旦为主的大学生们走的比我们更远，他们要去清查张春桥、姚文元的叛徒背景，作为中学生的我们主要诉求则是声讨反

动血统论，结束学生整学生的局面。我们学校所在的地理位置使血统论引起的学生摩擦特别厉害。如果学生构成没有那样复杂的话，也许学生斗学生不会那样残酷，也许不会发生红卫兵一再打死人的惨事。

1968年我被当时上海市革委会的主要成员马天水、徐景贤以莫须有的罪名正式宣布为反动学生。我和中串会的其他一些主要成员先被空军派来的军宣队关在市里的一个学习班里，军宣队以莫须有的罪名将我打成现行反革命，并要其他成员揭发、斗争，说我出身反动，文革中反毛泽东、反市革委会。三个月后，见查不出什么证据，又把我放在徐汇中学的牛棚里关了近一年，每天都要打扫厕所，清理教室。与我们对立的红卫兵对我经常打骂，有几次差不多给他们整死。

例如1968年夏天的一个下午，一群红卫兵将我留下，要我长时间地弯腰，鞠躬，认罪。到晚上他们又将我押到一间黑屋里，将我的眼睛用黑布蒙上，然而用课桌椅的腿死命打我。椅子腿都被他们打断几根。这些人在去黑龙江之前疯狂地向我泄恨。等他们离去时，我已遍体鳞伤，无法行走，只能在夜幕的掩盖下慢慢爬回家中。正在苦苦等我的阿婆见我浑身是血地爬进家门，几乎当场晕过去。当时我身上已经没有一块好肉，连衣服都已变成碎片，由于浸透了血，牢牢地黏在身上。她来帮我脱衣时，一撕便连皮带肉撕了下来。我尽管痛得不行，仍不敢大声喊疼，怕阿婆更为伤心。此时的她早已成惊弓之鸟，每天生活在恐惧和不解之中。但她从来没有说半句对我生气的话，只是连连叹气和流泪。她的内心坚决认为我是个好人的。

后来阿婆用温水慢慢浸湿我的汗衫和短裤，使皮肤和衣服之间的血块慢慢溶解，才避免撕下我的皮肤。那几天我彻夜无法入睡，白天咬着牙照样要去学校劳动。尤其令人发指的是，打我的红卫兵见我身上敷了药和贴了膏药、纱布，立即逼我交待何处接受的治疗。我被迫说出是阿婆深夜偷偷从一位好心的邻居家要来的。这帮红卫兵竟然丧心病狂到要我立即说出邻居的地址和姓名，气势汹汹地去那家邻居兴师问罪，大肆骚扰，并责令我不得再敷任何药膏。我真不知他们安得什么心。

我非常感谢徐汇中学的一名原籍山东的校工。我叫他张师傅。他因为成份好，成了我们那个牛棚的领导。每天由他布置我们的工作。他对我暗中有所照顾，但是对我动不动被人打一顿、踢几下也防不胜防，因为他不可能老跟着我。如果我去跟他反映，他就会要我自己当心，牛棚里关着几十个牛鬼蛇神，都是当年我非常崇敬的老师。大家劳动起来很分散，他实在顾不过来。但有一次张师傅真的急了。那次他分配我去打扫大操场。我们学校算是上海市区内最大的中学。学校西边有个很大的运动场，运动场的一头是西校舍。他以为这样我可以远离学生。不料那天有一帮对立派的学生从西校舍的二楼窗口见我在打扫，便大声叫我过去。我知道不过去可能更麻烦，便不情愿地过去了。他们要我紧靠墙根，低头向毛泽东请罪！见我低头后，他们就从二楼将一把铁脚椅子狠狠摔到我的头上。我们学校是个法国人设计的、有150多年历史的教会学校，每层的层拔很高，加上有露出地面的地下室，二层几乎相当于一般楼房的三层。当时我只感到天上突然有重物击在头上，便昏死过去。

等我醒来，发觉满头满脸都是血。此时已经有人报告张师傅。他赶来之后就用手绢把我脸上的血抹干，并用手绢按住头上冒血的部位。当时二楼的那帮学生早已逃之夭夭。张师傅就站在那儿骂了半天，然后就说：找工宣队去。当时校长早已打倒，工宣队的队长坐在校长办公室里看报。张师傅扶着我进了办公室，指着我的头上的伤和满脸的血痕对那个队长说：这个学生现在还是活的，不定哪天我只能还你个死人了。不过那可不是我的责任。我看不出这个学生到底反动在那里。再反动，他总没有死罪。今天我先告诉你一下，这个学生我没法管下去。这样下去，他很有可能要活活整死掉的。工宣队队长害怕起来。因为真的死了人，万一上面追问，他们也不好交待。他们商量了半天，决定把我转移到一个工厂的牛棚里去。工厂里的工人大多



对我很同情，对年纪这么轻的学生变成了反革命，十分好奇。问来问去也没有人讲得清楚。实际上我不过写了一些文章批判反动血统论，另外对市革委会有些不满的言论，这算什么罪呢？工人们觉得我太可怜了，对我相当保护。我在工厂的牛棚里待到1969年的春天，虽然体力上累一些，虐待和生命危险总算躲过去了。

1968年的冬天和1969年的春天，毛泽东大规模发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几乎是被从牛棚直接送到吉林省梨树县的刘馆公社，在那里待了将近四年。一开始，一群准备去内蒙的对立派学生不知出于何种动机，竟然对工宣队提出，要我跟他们同去。消息传出，许多朋友对我说，如果我去，就是自投罗网。因为有了牛棚的经验，我对工宣队坚决表示不愿意去内蒙。幸好有几个同学去找工宣队，表示文贯中家庭极为贫困，无力准备下乡所需物品，但他们愿意和我合用所有物品，希望工宣队同意他们和我组成一队，同去吉林。工宣队认为这样也好，可以省去他们的不少麻烦。我们到当地公社后，带我们去的领队跟公社干部作了交待，要他们注意我的动态，因为我的家庭出身复杂，在上海当过反动学生。所以一开始，农民和我说话时的眼光都是怪怪的，似乎在琢磨我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坏人。在他们的脑子里面，坏人应该偷鸡摸狗，吃喝嫖赌。他们大概很难理解什么是有‘思想问题’的坏人。第一年不少人常常在那儿议论我，觉得这个年轻人如果是个坏人，为什么干活挺努力？为什么主动帮人写信，讲外面的新鲜事给他们听，给他们念报？为他们针灸？他们觉得看不出来这个年轻人究竟坏在什么地方。第二年以后他们就不理这个茬了。大概他们逐渐意识到反动学生罪名是冤枉的，可能因为家里成分复杂，受牵连了。

我们几个男女同学一开始分住在农民家里。接待我们的农民都是村里比较能干，条件比较好的农户。他们在生活上已经竭尽所能照顾我们，但是由于自幼形成的习惯实在不同，我们生活上感到十分不便。一直等到两年以后，我们才盼来了自己的房子。我们的房子盖在村子当中，有十个知青合住，生活改善不少。例如，我们终于可以按自己的口味做饭炒菜。我们每天洗脸洗脚的习惯，不再引起柴禾奇缺的农民的不满。晚上也不用为了省油，早早地上床，可以看些书，写些信。我们每天仍和农民一块下地干活，到队部开会。后来我成了人民公社的宣传员，和农民通讯员一块去采访水利工地的模范人物和先进事迹，写成报告广播出去。同去的一位同学会拉小提琴，有段时间我们便成立了文艺小分队，组织舞蹈，唱歌和话剧表演。当时我负责编剧本和导演，记得写了一个宣传珍惜粮食和勤俭建家、勤俭建社的必要性的剧本。农民中也有加入我们小分队的。我们一块劳动、一块表演，和农民成了好朋友。

下乡的经历，使我真正体会到为什么人们常说，中国的问题就是农民的问题。特别是下乡一开始的两年多，我们借住在老乡家里，目睹了农民所过的生活。大部分农民极为纯朴。他们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生活是何等的贫困和乏味。所谓虱多不愁，一部分农民大概已经认为穷是正常的，永恒的。由于他们的生活圈子是完全封闭的，他们无法想象出现代社会可以创造出一种完全两样的生活方式来。我从小在上海长大，而且从小经历过贫困。照理说，我不应该对东北农村的贫困感到太大的震动。然而从上海初到东北，目睹很多难以接受的事物，农村的赤贫和上海的现代文明还是在我的脑海中造成强烈的对比。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了赤裸裸的贫困。尽管我上中学的时候，几次到过上海郊区农村，帮助农民抢种抢收。但是上海郊区毕竟是鱼米之乡，食品供应比较丰富。农民住的大多是砖瓦房，面积较大。我们并不会用赤贫两字形容他们。在东北我亲眼目睹了农民的赤贫的生活。首先，房子全是用土坯和泥建成。我们和农民一样整年吃窝窝头和高粱米，一年只有一斤大米和一两斤白面。农民一年只吃两次肉。一次是上冻前后，除了老母猪外农民将所有的猪都杀掉，因为没有粮食喂养它们过冬。杀猪后，农民先把边边角角的肉吃掉，留着最好的肉用水冻上，挂在户外的梁上，等到春节时才化开冻肉，大吃一顿。他们一年中有大半年靠着臭大酱、腌酸菜、腌芥菜生活，连油花，肉末都不见。有些农民的孩子已经十几岁了还没有一件遮体的衣服。我不知道这种生活怎么能长此下去。

第三年后，男知青中仅剩我一人任何招入单位都不感兴趣，其他人或者已经上调省城，或者在县里当篮球教练。农民知道由于家庭的原因，我上调的机会不大，便好心问我，是否打算在此落户。我强作笑脸说，也许吧。我一直在苦苦思考，难道他们的生活也将是我的最后归宿吗？

我慢慢意识到，毛泽东把那么多知识青年送到乡下，其实是城市无法解决他们的就业。然而，他的这种做法自以为高明，其实是对现代化的倒行逆施。中国整体人口素质低下的主要原因，和人口的大部分是缺乏教育的农民这一点分不开。由于人均土地极为有限，农民必须把自己的主要精力几乎无穷无尽地投入到这块很小的土地中去才可能讨得一份生计。农民往往十几岁便不得不放弃教育机会下地干活。成家之后他的整个精力和时间更加被绑在土地上。极大部分人再也无法更新自己的知识，开拓对外部世界的了解。他们操心的便是眼前的一些事，无非是一头老母猪，几只老母鸡，一小片自留地。他们之间议论最多的是庄稼长得好不好，到了年纪能不能盖得起一间泥房，是不是娶得起媳妇。成家后的农民象他的父辈一样生出一个一个的小孩，开始一个新的循环。这种生活我当时觉得不可忍受，但是又觉得束手无策。

农村生活也使我第一次了解到毛泽东的极左的路线、政策造成的人间炼狱式的灾难。例如，有一次在田间休息时，我和一位上了年纪，经历过旧社会，出身下中农的农民老大爷聊天。我突然产生一个念头，要他告诉我他一生中最悲惨的经历。我原意是要听他忆苦思甜，讲讲他在1949年以前处于俄国人和日本人统治之下的满洲的所见所闻。此时其他农民都在地头的另一边抽烟，说笑，玩游戏。他见四周无人，便悄悄说起有一年村里如何粮食短缺，饿死许多人，活着的人也人人皮包骨头，气息奄奄。因为只有野菜充饥，大家整天肚子淌清水。他的老娘就是经不起饥饿的折磨去世的。他自己则每天饿得两眼发黑，可是不得不下地干活。我问他这场饥荒发生在哪一年，他并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只是含着泪说，比起他的老弟，他的命还算好，总算活下来了。他的老弟那年已经饿病在炕上，无力起身。但是支部书记认为他在装病，一定要他立即从炕上起来，下地干活。他的老弟挣扎不起来，书记命令来人将他押到地里。他的老弟东倒西歪地来到地里，干了没多久，便倒在地上，再没起来。我听了十分同情，也十分困惑。难道俄国人或日本人统治时期也有支部书记的设置？我这一问，他才吞吞吐吐地说，我说的事发生在1959年和1960年，但是这段时期确实是他一生中最悲惨的时候，再没有比这段时期更苦的了。

我听了他的回答，一时目瞪口呆，又惊又怕。惊的是，自幼时起，书报杂志常常见水深火热几个字形容旧社会的生活，因此我总是认为贫下中农只有在旧社会才会过上苦日子。现在才知，原来毛泽东当政时期贫下中农的生活也可以比旧社会的更苦。如果不是眼前这位面善而纯朴的农民含着泪水亲口对我说出他家的悲惨经历，我是不敢相信的。当时关于三年饥荒的事遭到全面封锁，报上只提三年自然灾害，并把粮食供应上的困难怪罪于逼债的苏修。这是第一次有人对我提起大跃进时期因严重饥荒而造成死亡的事，其效果不啻是一场心理地震。怕的是，当时仍处于文革的非常时期，三天两头要揪三反分子。万一有人听见我们的谈话内容，报告公社，我们两人中至少一人会被立即打成反革命。因此，我赶快要那位老农不要再公开提起此事，并告诉他，我也不会再对任何人提起。然而他的这段凄惨的故事已经永远印在我的脑海之中。毛泽东通过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目的便是要捍卫三面红旗。但是老农的亲身经历，以及自己在公社中的经历，使我对三面红旗的正确性，以及对毛本人一手制造的关于他自身永远正确的神话，逐渐发生怀疑，对文革的正当性也逐渐幻灭。

艰苦的岁月中，也有一些使人感到温馨的事。至今想来，还会泪湿衣襟。我和几个胆大的公社干部有机会彻夜谈心，大家对四人帮的种种倒行逆施恨之入骨。这些交心的谈话使我得到不少的安慰，不但知道了别人和我有许多共同的想法，而且坚定了信念，知道四人帮的种种劣迹迟早难逃人民的惩罚。农民对我们的爱护也常常使我潸然泪下。春节的时候我们中的大部分

人已经回上海去了，所以我们知青往往无从分享他们那时大碗吃肉的快乐。但是九、十月份上冻时节我们人还在，农民杀猪后对我们十分慷慨。尽管他们一年只吃两次肉，这时他们中的一些人会用大碗装了使人口馋的酸菜烧肉，香味扑鼻的大肠血汤，热腾腾地送来让我们品尝。有时候农家孩子会问自己的母亲为什么要给我们送肉，为什么不留着自己吃。农家大妈会说，这些上海人也真可怜，他们都是千里迢迢，舍家弃业，来到这里的，平时身边没有父母的照顾，没吃没喝的，给他们吃一点吧。这儿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乡。你们以后也有出门在外的时候。想到这是农民们从自己口中，甚至是从自己的孩子的口中省下来的肉，我们感动不已，对他们的心意也格外珍惜。不知今日有多少上海人会去主动帮助外来打工的人，会有多少上海人教育自己的小孩，省下自己的食品、衣服，送给外来打工者的孩子们！直到现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的脑海中还会浮现出当年插队时的一幕幕感人的景象，老乡们的音容笑貌犹历历在目。1988和2002年，我曾两次跋涉千里，到插队的村子看看老乡，看看村子的变化。农民已经大多住上了高大、明亮的砖瓦房，并普遍改种了水稻。生活比起当年文革时期来是强了很多。

□ 摘自“饱受磨难后的思考”，原载《观察》

~~~~~

【往事如烟】

重庆文革口述史——黄廉访谈录（八）

• 老 田 •

（续上期）

十七、革委会成立之后的北京学习班

省市革委会成立之后，我感到派性没有消除，武斗断断续续，革委会工作的干扰很大，军队也有派性，市里面执行日常工作的干部还是原班人马，结合进来的老干部中间许多人对受群众冲击还是耿耿于怀，办事方法还是他们熟悉和喜欢的老一套，要建立起新的、受群众监督的政权体制，谈何容易！群众代表起不到任何作用，基层革委会建立不起来，军代表里面同样有我们在北京所遭遇的问题，革委会的威信一时还建立不起来，工作无法顺利展开，群众代表更是两头受气。

我们都是忙着做平衡工作，反到底推荐的干部八一五要反对，反过来也一样，参加革委会的人两边都要对等，一碗水端平，经常为此发生纠纷，甚至一派把一派赶出来。清队开始之后，也是一派清一派。这些矛盾一出来，就要我们去做工作，弄得不好，我们自己也成了当官做老爷的一份子了，有的群众说你自己当了官就行了，还下来反对我们干什么，反而在群众面前说不起话了。还有些派性的军队干部和思想不肯转弯子的老干部从中作梗，事情就更难办了，矛盾越发难以消弭。

1969年四川省革委会召开第八次全体革委会委员会议，由我主持，省革委会委员张闾在会上做了长篇发言，讲了一个上午，他要求下午继续讲两个小时，李大章说我的腰不行了，坐长了受不了；张国华说要我掌握会议的节奏，我说让他讲吧。张闾最后的结语我还记得：如果走资派的黄龙旗在天安门前升上去了，五星红旗就要落地了，他对革委会成立之后的形势还是很不满意，会后张闾下去组织了“马列主义研究会”，后来也因此受到打击和陷害。

在四川省革委会第八次全委会之后，重庆市举行了第九次全委会。同志们要我在会上做主题发言，要把问题讲透，一些同志还非要我脱下绿军装，去现做一套中山服上台去讲话，我穿

着新衣服进会场，周家喻说你们跟演戏似的。在这个全委会上，我就革委会成立之后的一些不好的现象作了充分的批评，说革委会是新瓶装旧酒，是穿新鞋走老路，按劳分配是一个空壳等等；鲁大东本来想要逃会，也被要求留在现场听讲。我在这个会议上讲的一些主要观点，都被他们当权派记了帐，后来整理成“黄廉反动言论录”，在京西宾馆会议上送给康生。这个会议是造反派在革委会里面起作用的最高峰，此后就不行了；相比较而言，河南结合进去的代表基本上是刘建勋说啥就是啥，四川的造反派进革委会之后还硬是不让步，这也主要是体现在省第八次全委会和重庆市第九次全委会上。会后重庆市下了文件，一些单位的群众代表还算是落实了工作分配。此后重庆还开了三次全委会，基本上都是走过场，主题就是贯彻党委的意见，办公室的处长们在工作上主要都是去跟党委联系。进入革委会的群众代表，大家也感到无可奈何，都是有气无力的，还有很多群众代表被抓被关，有的就被免职了，在反复旧运动和批林批孔运动中间，也只是在奄奄一息之中的挣扎。特别是党委成立之后，就代替了革委会的作用，革委会开会基本上都是应付；重庆市革委会的牌子，被太阳晒跷了都没有人去管，跟旁边重庆市委的新牌子形成鲜明的对比。

1969年8月26日，在灌县水校办学习班，全省各专县合计有6000多人参加，军干部与省革委会和中央的想法并不一致，我作为学习班的领导成员之一。在学习班中间传达了林彪的一号通令，军区司令员、政委，两个军的领导都在那里，喊大家不要再争论了，战争很快要打起来了。在会上，张国华、谢正云、茹夫一都做了报告。那个时候从中央到地方的斗争非常复杂，当时我也看不准问题出在哪里，仅仅是群众的派性和消极还不致如此。

学习班根本不学习，很多人已经是各个单位革委会主任副主任了，基层看来他们都已经是大官了，军代表也不见得管得了。许多人行为仍然是欠检点，一些人的情绪甚至消沉到去摘老百姓的瓜，有一天我们寝室晚上没有人了，第二天山上的道士打电话来说，你们的人把我的狗打死了，原来以为是土匪；有人玩得命都不想要了，在都江堰进灌口那个地方打赌，下水去比赛谁先游到对岸，水流太急，下去之后个个都喊救命。派性本质上还是无法消除，我确实是忧心如焚，军队也很恼火，听省里和军区领导说准备抓办几个头头。我也感到很无奈，自己也脱队去成都要去了。

我从重庆调去几个人办《四川文艺》，我推荐画家王以时和歌唱家李天鑫。正在跟王以时聊天的时候，省革委会办事组长郭一民来了，多的话也不讲，要我立即上车去双流机场，我看见飞机的螺旋桨已经在转动了，省革委会和军区的领导都在飞机上了，到北京之后，一车就拉到京西宾馆。我问李木森这是怎么回事，他也不知道，一个新华社的记者回答说，中央准备第三次解决你们四川的问题。

晚上就正式开会了，张国华、梁兴初、刘张就没有上主席台了。台上有周恩来和康生、陈伯达、李先念、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叶群，没有江青。由周恩来主持会议，大家都感到这个会议的气氛很肃杀，感到有些不妙。

周恩来主持会议，他首先说“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这是毛主席说从前是这样，现在革委会已经成立了，生产受到严重影响，你们四川的工作仍然跟不上中央的要求；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把你们找来解决四川问题，有些是以前已经解决了的问题，我再来问一下，王茂聚同志，在攻打泸州的问题上，你调部队去过，有这个情况没有？王茂聚回答说：当时泸州一派受压，我们不去支持，一派就要被消灭。康生跟着说：我看你为人还算老实，是个木匠出身，办的蠢事也不少，身为政委，怎么调动军队去武斗？王茂聚回答说：这个事情我向总理请示过，周不吭气。马上康生就转移话题，问彭家治来了没有？听说你把石油局的车子都开出来搞武斗了，全部开出来干什么？真是败家子，什么英雄，搞武斗也是英雄，周恩来接过话头说：你英雄好好当嘛，当败家子干什么，我看你干坏事也干不出。康生又突然点出邓兴国，问

你派性克服了没有？邓兴国写了个东西准备了发言，当时一着急找不到眼镜，双手在桌子上到处摸，有点手忙脚乱，康生说：你是工人，还戴了眼镜，不象个工人。邓兴国回答说：我在努力克服，派性是两方面的问题。康生又问，谁叫康自忠，你写了个啥子东西，说革委会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三结合也是一个形式，我们两个人五百年前是一家，你是个臭知识分子。接着又把郭一民点起来，说你在省革委会办事组，办的是什么事，你恐怕是跟派性办事吧。由康生的讲话，一开场就给与会者一个下马威。

康生一个个挨着批评，有个军人抱了一摞材料出来，康生大声喊叫说这是刘结挺、张西挺、邓兴国、黄廉、周家谕的反动言论录，康生边分发边说，革委会是穿新鞋走老路，新瓶装旧酒，目前按劳分配是一个空壳，革委会所用人员还是旧省市的人，还是按照老原则办事，他把我的言论念完了之后，马上说黄廉来了没有，我站起来，康生说，你放屁，你们在搞反复旧，我看反复旧必复旧。我听他这么说忍不住笑了。他又问，你是干什么工作的，我说是秘书工作，康追问不是说你是会计吗？这个时候周恩来说，听说你是海军的，周还回头去找李作鹏说这是你的部下，把话题岔开了，周说你精干，也会写一些东西，不要再搞小报了，毛主席已经不看小报了，还是要克服派性。这样康生就说不起话了，要是让他继续骂下去，我说不定又要成反革命，这次不见得走得脱。

周恩来接着说，现在大家先休息一下，等一下看你们怎么搞武斗的电影。大家都散开了，我正趴在桌子上埋头记与康生的问答，周总理走到我的桌子边上，问：黄廉，在干什么，说握个手吧，然后叫出去走走。当时全场的人都转过头来看稀奇，我只听到一片椅子挪动转向的声音。周边边走边问我在北京认识哪些人，认不认得蒯大富，知不知道五一六是怎么回事，我回答见过蒯大富，五一六一概不知。周说你们夺权之后，还是要好好支持革委会，他提到刘张的派性问题，我说根子还是在军队。他还说，黄廉，回去之后，还是要把革委会的威信树起来，还是要依靠军队。我和周总理在通道上边走边谈，他突然吩咐卫士去把周家谕叫来，等周家谕过来后，总理说你这个知识分子也是派性十足，你那个八一五要注意克服派性。周家谕回答说，我们谈不上派性，总理说：好吧，我们回去看电影，看完电影之后就知道了。

这个时候五十四军已经调防云南了，13军入主重庆了，13军的何云峰政委和苏副政委，问我总理谈了些什么，我心里想你们13军不知道整了我多少黑材料，心里正没好气，说没有什么。李大章也过来问，我说没有什么内容。郭一民被康生和邱会作骂了之后，简直是萎靡不振。这次京西会议解决四川问题，上场都是点名批评，我感到周总理对我的亲善态度和谈话，是一个有意的安排，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解脱，13军对我的看法和谈话态度就不一样了，那个时候喊人人过关，我没有理他们，结果康生发下来的反动言论录在会上也没有展开批判。

电影的名称是《突破口上红旗飘》，拍摄的是“武装支泸”的事情，康生一开口就骂什么红旗飘，我看是黑旗飘。影片里面有武斗牺牲者的尸体，燃烧的钟楼，王茂聚去送花圈的场景，康生边看边吼，王茂聚，送花圈那个人是不是你，你看那个钟楼；影片中间有武斗队员进攻之前的宣誓场面，康生就说你们看派性害死人，你们真打敌人有没有那么勇敢？为了派性就这样；康生完全是一个义务解说员，从头骂到尾，电影放完灯一亮，康生说四川怎么搞得好，你们明天就去讨论这个问题，检讨你们自己。

在京西会议上陈伯达也讲了话，他说同志们要谦虚些，一个人要多找自己的毛病，多检查自己，你们要克服派性，不要光看到别人的缺点，派性说到底还是一个私字，能不能斗自己的私，你们要克服派性，我这里有一首诗送给你们：行百里者半九十，言晚节末路之难也。周总理说伯达同志的话需要翻译，他说最后的几步才是最艰难的，保持自己的晚节，最后的几步路往往是最难做到的。庐山会议之后，陈伯达出事了，我才知道那几句话其实是他自己的心境，表白自己人生选择之艰难。

第二天开会就是要人人过关，我没有起来发言，何云峰跑来跟我说，你恐怕还是要谦虚点啊，他叫我们继续讨论。何云峰出去一阵后回来，我看到他脸青而黑，说告诉你们一件事，王茂聚自杀了。军委派人到了现场，就把尸体弄走了。我问内江市革委会副主任段守章，他同王住一个房间，他说自己出去耍了一会，回来就看见老王悬在窗户上了。我想王老头个性很强，康生的几句话太重，对他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我说，老王肯定不会是自杀，何云峰脸色立刻就变了，说黄廉你不要乱说，不要看中央领导对你好，这是非同小可的事情。

这样的会议大约开了半个月。在会上，康生拿着冉庄写的小册子，说他是为刘张树碑立传，批评“翠屏山上五棵松”的形容，问田禾你是一棵什么松，怎么“刘张王郭”有郭一民，反而没有你的位置了呢？田禾说算了，邱会作说，怎么算了呢？你可以坐在我的肩膀上嘛！会上一路都是批评，刘张两挺从此没有回过四川。我深深感到如果不是周恩来，我也走不脱。会议完后就叫我和周家喻先回重庆去，传达会议精神，做团结稳定的工作。

周总理曾到重庆组来参加过一次讨论，是在四楼会议室。总理说你们这次回去，两个都要作自我批评，不能老是觉得自己正确；现在的问题是需要安定团结，要支持革委会发挥作用，把生产搞上去；回去的任务是着重作团结工作，要批判刘张陷入派性的错误，克服派性很重要。我在会上谈了一些具体的困难，革委会虽然成立了，解决问题很困难，一些基层革委会建立不起来，但是军队依然有倾向性，清队也是一派清一派，名义上是团结，实际上是暗斗。周说你们两个要首先团结起来，军队要起主要作用，必须一碗水端平。何云峰说过去有对不起反到底的地方，但是不存在支一派压一派。周总理最后说：黄廉，刘张是有偏向性，周家喻你一派自认为有优势，都要作自我批评，你们两个就起带头作用，懂不懂起带头作用的意义。我和周家喻就先回重庆了，留下的同志分系统在北京办学习班，钢铁系统、军工系统、重点工业系统，分为三个层次，又去了几千人。这一次学习班主要是解决武斗和派性问题，没有成立革委会的要作检查，军队干部群众的学习班。我和周家喻回来之后，是共同到各个单位作了一年的报告。

在北京的学习班里，一些人对我有异议，说哪个修了，右了。市革委会给我传达了一个讲话，说李先念讲：在克服派性的问题上，有人说黄廉右了，下一次他到北京来，我看见他要跟他握手。之后就有人回来跟我开玩笑，叫我快去北京，李先念等着要跟你握手。也是在这一轮北京会议上，邓长春和方文正被逮捕了，两派一派一个，省革委会讨论免去邓长春和方文正的常委职务，这给我们造反派一个明确的信号。

周总理的工作方法，还是比较讲艺术，善于处理复杂关系，应变能力也很强。他们把头头们集中到北京去作自我批评，实际上是把头头隔离了，我和周家喻回去给群众做工作阻力小些，做些促使两派群众的团结工作。在京西宾馆会议第三次解决四川问题的会议之后，刘结挺和张西挺的政治生命结束了，从此再也没有回四川工作过，除了后来坐牢之外；1969年也是在国防工业系统单独召集的学习班里（这个会议是1969年8月15日开始的，称为815会议），邓长春、刘文正同志进了班房；这样的变化不是几个人的孤立命运，这是造反派命运和文革运动一次很深刻的转折。

十八、“批清运动”和“四不准学习班”

传达京西会议精神，实际上更多的是我们在群众面前检讨。1970年传达总理的指示，要我和周家喻到工厂里去与工人打成一片，周家喻说我们被利用完了。市革委会开会的时候，还征求我们的意见，周家喻说他还是回原来分配的单位红光厂，我也说回原单位，岳林说你回木材公司还是当干部搞宣教，等于没有下放，要真正摸到机器，出产品。13军副政委陈占楼说你还不到40岁，还可以学手艺，真正和工人一起劳动，要到大型厂矿集体生产中去，与工

人“同吃同住同劳动”。最后革委会为了我们回机关开会方便，把我们两个都下放到长安机器厂三车间，他当车工，周家喻很年青学得很快，我年纪大了还是适应很慢；我开始也是车工，因为车床高速运转有点危险，书记就帮助换了一个工种，去请示革委会，上面只要我们在车间劳动怎么都好，至于什么工种他们无所谓，这样就安排我去开磨床，经过两个月我才慢慢适应了一些。

1971年4月底的时候，我的师傅方师傅对我说，你来了这么久了，你师母想请你吃一次饭，喊我晚上去他家里，我把周家喻也喊上一起去了，免得鲁大东他们又说搞派性分裂。

去了之后方师傅对我说，开会时听说你们又要去学习班了，不知道是好的学习班还是不好的。我说学习班还有什么好不好，方师傅说如果又是批判的学习班那就不好。4月30日晚上总工会在文化宫开文艺晚会，我和周家喻坐在前三排的首长席上，左右的位子都是空的，工会的刘钟林说今天只有你和周常委是领导，等会你们上去谢幕。出来之后我的车子开走了，旁边的人说你们两位坐一辆车子回市委。到了之后，鲁大东、陈占楼和丁长河三个人在那里等我们，他们都很严肃的样子，陈占楼先说：黄副主任、周常委，中央有个通知，为了提高思想觉悟，进一步克服派性，是不是就请你们从明天开始就进学习班，学习班就办在你们本单位。周家喻还是回长安厂，他还很高兴。

第二天市革委会就派了一辆华沙车，送我回木材公司。迎接我的是书记和保卫科长，他们说前两天刚刚听说，你要回来学习，我们还没有准备好，先在礼堂的地下室将就，为了你的安全，我们安排小何、小梁和小刘三个人陪你一起学习，在你的帮助下，他们也学习一点东西，你们三个吃住都在一起，以后会慢慢增加人的。我问学习怎么没有文件，书记说江青同志不是规定了你们要学六本书吗？他们现去书店买了六本新书。

他们很愚昧，那些书哪能帮助我们去反思五一六的问题呢？我读了《法兰西内战》和《哥达纲领批判》之后，越发认定他们就是走资派，结合造反派的现实处境，我更深深感到文化大革命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13军政治部主任陈占楼很严肃地对我说，你学了这六本书，提高了觉悟，现在转入下一个阶段，主要是交代你在北京怎么与五一六联系，下面又发展了谁。他们干脆说五一六全部是单线联系，上不告诉父母，下不告诉子女，这样定五一六分子就可以避免取证的麻烦了，节约运动成本。我对陈占楼说：你们这个搞法是非常错误的，我的副主任是毛主席定的，你只是军队支左干部，在革委会办事组负责，你们控制我，三个月不让出门，还要搞四不准，不准会客、不准写信打电话，不让家属探视，连饭也不让吃饱，真正反对革委会的人应该不是你。

陈占楼说，现在我们军队管这个事情，五一六有国际背景，还与极左派拉美的游击队和格瓦拉有了关系，实际上当时谁也不知道格瓦拉是怎么回事，反正里通外国就是不好。旁边的人劝我好点说话，我说你们懂什么，他是我的下级。陈占楼还说从今天起明确，生活上丝毫不要克扣他，他自己出钱买饭菜票，但是要问题弄清楚了才能回市革委会。我就反问他，你告诉我五一六有什么破坏性，他说是反对毛主席和反对林彪的，我问他反不反周恩来，他说凡是中央领导都反嘛。我说就是坐牢也要容许家属探视的，现在天气都冷了，我的衣服不够，我还要看看家里的人。陈占楼说：那要等到你都交代了，问题作了结论才行。整个“批判清查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运动，简称“批清运动”，实际上就是系统地打击造反派的运动，本质上就是算文化大革命的帐。

我刚刚来的时候，大家都躲着我，八月份开始就有人想要找我谈话，我去厕所时就发现厨房的炊事员，等在台阶上要跟我说话，他问我那些人到底要搞啥子嘛，我说他们说我是五一六，他告诉我同志们在外面为我鸣不平，是军队与地方有矛盾。时间长了之后，看管我的人也累了，

有一天我翻窗户进入储运科，给新华社拨电话找谢文欣，结果他不在，接电话的人问我是谁，有什么事，我说我是四川的黄廉，已经被人不明不白地关在地下室快半年了，是偷跑出来打的电话，请他给周总理或者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反映一下，我的话还没有讲完就被发现了。

这下子可不得了，13军的领导，市委派来的处长，公安局的人，都来了。我说打个电话有什么不得了，他们说问题大了。训斥那些看守我的人，说他们无用，说从此之后要加强看守，吃饭上厕所都要跟着。开始是七个人分成三班昼夜跟随，慢慢地减少了，军队和公安局的人就不来了，我就分析这个事情，判断外头绝对是出了大事情。有一天，外头一个挑水的人，趁人不注意，丢给我一个字条，上面只有几句话，说中央出了大问题，你要保重身体， he 说是外面两个干部模样的人叫我摔给你的，我认不到他们。

九月底的时候木材公司开批判大会，批判我这个五一六分子。我说光是你们说不行，我要求在大会上发言，结果他们同意了。我就说，你们说的那些东西都不是事实，我来跟你们讲一讲五一六，北京最开始是有个五一六兵团，是从“联动”演化过来的，他们反对周总理和中央文革。你们这么多的科级以上干部和党员，毛主席说凡事都要问一个为什么？我来了有半年多，走进门来就被关起，这一次清查五一六完全是人身迫害，是慢性谋杀，你们连这点觉悟都没有？我量视你们的书记和局长，也不清楚现在形势的本质，这又是一次对文化大革命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新反扑。从这一次批判会以后，他们就没有那么嚣张了。

快到春节的时候，我老婆穿着军装来接我，她拿着一张条子，上面写着：黄廉父亲病危，经鲁大东同志同意，并经市革委会常委讨论，准假三天。木材公司的人说，最好拿一个人跟去。我老婆告诉我说，林彪已经坠死在温都尔汗，你们这一次清五一六的事情就是他搞的。我老婆流着眼泪告诉我，因为你参加搞文革，从二月镇反到武斗，直到现在全市到处开你的批判会，你父亲一点都不明白，现在得了脑溢血了，你进去病房看看他。我进去看父亲，他双目紧闭，我喊了他几声也没有回答，我的眼泪不知不觉就留下来了。回头找那个跟着我的人，我老婆说，他早就一溜烟走了，哪里还敢留在这里，等会你兄弟伙来了要打死他。晚上兄弟伙来了，我就给北京打电话，以前的号码没有一个有效，我问新华社，有个记者告诉我，反正是有人陷害你们。我要去市委找鲁大东谈一谈，大家都要一起跟去，我给周家瑜的老婆打电话，她知道我出来了，也去跟鲁大东要人。我们到了市委，13军的陈占楼根本不敢照面，把李丙灿支出来应付。

第二天我父亲就去世了，发丧的时候，大家提出要游行，我老婆死活不同意，说事情闹大了不好，父亲自己岁数大了，他也是太着急了。汪友根来致悼词，他是鲁大东的最相信的，在悼词中间本来是要说“受到林彪死党的迫害把老人家整死了”，后来改成含糊糊的说法“受到各种打击”，有四百多人到场参加，几十辆车子，口号越喊越变，最后说是鲁大东迫害死的。丧事过后我去找鲁大东，他说这个事情不怪我，办你的学习班是经过梁兴初批的，军委办事组也是有人批了字的。各个单位都起来揭发，在这次所谓的“批清运动”中间，他们在重庆又逼死了十几条人命，接着就是批林批孔运动了，我们总算又喘过一口气来了。

市委又给我们安排工作，我和周家瑜又回到市委落实政策办公室去工作，设在市委二号楼，由我们这些人去给那些被冤枉的人去赔礼道歉。九一三事件公开之后，支左干部逐步离开了地方，鲁大东等人开始全面掌权，但是原来被打成“三老会”的老干部、川东地下党的老干部，依然受到他们的压制，不解放、不使用。

十九、鲁大东们的政治手腕

1973年新的阴谋又开始了。是年10月当时的省委把我和周家瑜找到成都去，分别进

行谈话。参加的有李大章、段君毅、许梦侠、赵苍璧、明朗等人，谈话在省委四号楼进行，主要是给我做工作。李大章说你写给我们的信，我们都看了，搞五一六你又被错整，从二月镇反以来，你坐过牢受过打击，父亲也过世了，省委也知道；事情都过去了，革命者的胸襟要宽广，你读过费尔巴哈的哲学和自然辩证法吗？如果没有读过，我建议你看一看，这可以把自己的思想、情绪调整过来，真正的辩证法是对军队的看法，他们支左立了些功劳，也有些倾向性，成都邓兴国他们好过点；我们也在不断的做工作，刘张他们站在一派当干部也不对，除了我谈的这些事，他们也还有事情要找你谈。

段君毅立即插了个话，引发一个争论，我说共产党的历次运动，从土改、公私合营开始，历次运动的积极分子，都能够得到党的正确对待，唯独文革的积极分子多灾多难；大章同志，你是个老同志，你来帮助我解释一下，你们老同志受了打击，说清楚了就解放；强加给造反派的“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请问我们打倒了谁？全面内战和武斗的北京难道你们都不知道吗？动不动就说造反派搞极左，当权派对我们动辄关押、批斗，这是什么？比较以往的积极分子，我们响应党的号召积极参加文革，所有的活动都是在众目睽睽之下的，反革命行为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去施展的吗？毛主席、周总理，甚至李先念都表扬我们所做的工作，你们不承认这些事实，还把我当五一六反革命来整。明朗说：搞错了就平反嘛，跟你道歉嘛，不打不相识嘛，经过一次考验更看清了你，你得到锻炼了，道是无情却有情，在省革委会的各个场合，除了你就是周家喻。我说：明朗同志，你在老干部中间是有理论有水平的人，对我们的处境你心里明白，你只是弯弯绕罢了。明朗说：什么弯弯绕，我的不是事实吗？

段君毅装哈，他说：黄廉，你是左派嘛，我算是个老布尔什维克，要对党和毛主席有信心，军队对你的看法，都是客观存在的。看样子李大章不想跟我们谈这些，起身离开时指着赵苍璧，说留下一件事，他们来跟你谈。然后段君毅就开始讲话了，我们问你一个事情，你是不是曾经想出国，是不是受到国外给你的信，说是拉美国国际游击纵队很欢迎你，你知道不知道，切一格瓦拉你知道不知道，人家副司令的位置给你留起的。我左看右看，我看见赵苍璧、许梦侠也在相互看，我像是听到天方夜谭一样。这个时候，段君毅自己接上去说：你都不知道吗？看我不答腔，段君毅转而问许梦侠：梦侠同志你看呢？眼看要冷场，李大章的秘书周宏元赶紧接了一句：派性真是害死人啊。

段君毅接着对我说：这是我们的省委集体跟你谈话，是非常慎重的，今天我提的几点，你晚上加个班，把实际情况给省委写个材料，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明天我们继续谈。说完之后，很严肃的看着我。许梦侠说明天我有事情就不来了。周宏元说就是摆个龙门阵，向你了解一下情况，我说不知道，他沉思了好久，然后一言不发。回到锦江宾馆，我净下来思索了一阵，我用一稿张纸写了几条说明，第二天交给他们，李大章简单看了一下，然后就开始摆脑壳，说如果不是我们这些老同志还在，这个派性怎么得了？他又接着说，黄廉，你岁数不小了，还是抓紧时间做点工作，总理是看得起你的，也不要辜负毛主席对你的期望。我感到真有意思，这些“老同志”真是经验丰富，竟然一下子就相信我不是“里通外国”的人了；而且在没有经过任何调查的情况下，就一下子发现了问题是源于“派性诬告”，唯一让人疑惑的地方就是：他们的智慧和经验为什么一下子就提高这么多？

组织部长蔡协斌找到我，笑嘻嘻的说：如果不是这些老同志，有政治经验，处事谨慎，那就麻烦大了。回去之后，鲁大东对我说，揭露了这个阴谋是个好事，以前别人告你材料就在那里堆砌，你要他查他都不查。岳林说，不要计较了，这是敌人在策反，要么是派性诬告，现在已经结案，要是真的还让你回来？岳林的话我还算听得进去。

有一次我和周家喻在一起，恰好鲁大东过来了，我对他说，鲁大东同志，我跟周家喻团结蛮好的，没有什么派性。鲁大东回答说：你们团结是为了矛头对准走资派，他指着自已说，你

们团结我就难过了。就是同一个鲁大东，1975年竭力去推动批派性。还有一次在批林批孔会议上，我们讨论批判对象时，鲁大东指着自己的胸口说“我就是孔嘛，批我。”

1973年中央十大会议后，重庆出现了一个“十大宣传队”，主要是一些没有进入革委会的造反派，领头人是王汉东，他是广播电台的一个有水平的播音员。他们误认为说我们进入革委会之后，都是自私自利的人，我们又修了，右倾了，向走资派投降了，不管他们，他们并不理解我们的苦衷。他们要按照十大的精神重组革委会，在打倒鲁大东的同时要打倒黄廉周家喻，提出口号：要吃糖，不要找周黄。我不同意他们的观点，我以为红色政权建立起来不久，就要推倒重来，这个比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主张还要糟糕，在群众代表和干部中间，谁是决策人要搞清楚，有些干部结合进来之后，还没有改变过去的工作方式，这个时候就去打倒他们是早了，聂元梓他们要搞公社，毛主席肯定还是革委会好，本身是个试验，要努力进行探索和完善，不能动辄一举推倒。

他们恨我入骨，刘老么是杨茂林组织的四个杀手之一，说在三中全会之后如果我们继续当官，就要暗杀我。鲁大东先是一面放任他们，在一边看笑话，说是造反派反对造反派，出我们的洋相；我们在内部提出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办学习班提高认识，鲁大东置之不理；在外面鲁大东只宣传说他们搞乱了社会，说是有坏人利用操纵，街上的坏事都说成是他们干的，企图宣布他们是反动组织；对立加剧之下他们砸了派出所，警察起来游行示威，稍有政治常识的人都知道，没有官方背景警察能上街嘛？他们就是这样向上施加压力，鲁大东向中央汇报，表示手中没有尚方宝剑，无法办事。

这就是鲁大东玩的一石三鸟之计，在重庆拒绝听取十大宣传队的合理要求，不解决他们的问题，以加深我们和造反派群众之间的隔阂；放任他们在社会上胡闹，借机在宣传上丑化造反派整个群体；通过各种方式向中央施加压力，要求中央给他便宜处置的权力。一般善良的群众哪能看得清楚这么大的阴谋呢？群众有的一点点私心杂念，就被他们利用发挥到极致，以达到他们卑鄙的目的。这个时候我给中央写了三次报告，王洪文看到重庆的报告之后，就打电话给四川省委，这样依赖省委就找我、周家喻、鲁大东去省委商量落实，解决“十大宣传队”的问题，说王洪文指示要解散十大宣传队。省委领导说别人的话你不听，王洪文同志的意思你还是要考虑吧，要我们讨论一个办法，我和周家喻草拟了一个意见：说在群众组织都解散之后，再成立组织是不合适的；他们做了一些过头的事情，被社会上的坏人所利用，市委对十大宣传队还是要以批评教育为主；我们建议跟十大宣传队办一个学习班，让他们提高认识，让他们有时间反应问题，他们的问题在学习班里解决；他们合理的意见和要求，市委一定要解决。省里就批准了，中央也同意，王洪文也说要得。

我和周家喻还在锦江宾馆睡大觉，鲁大东就连夜赶回去了，第二天一早我去他的房间一看，满屋子是烟，厕所烧了很多文件。我们知道鲁大东肯定是要玩花样，我叫来周家喻看现场，并说出自己的推测，我们打电话要市委立即派车，车子拖拖拉拉始终不到。司机来了之后告诉我们，鲁大东昨天连夜回去了，等到我们赶回去，鲁大东已经把问题“解决完了”。鲁大东回去之后，要陈万明、李木森那一坨人，调动重钢的民兵，准备好棍棍棒棒分别住在几个宾馆里，一早出动几千人把交电大楼包围起来，给他们宣布说这是黄廉和周家喻起草的文件，还经过王洪文批准的省委正式文件，抓的抓，赶的赶走，王汉东在此前就被鲁大东他们抓起来了，这样就镇压下去了。

我们车子一到重庆，我要司机把车子开去交电大楼现场看一看，十大宣传队也确实不成话，楼上用铁条焊了三个临时牢房，门上贴上字条“黄廉关押在此间”，还为周家喻和鲁大东准备了房间。造反派内部确实也有很多事情，是对不起毛主席的，很多问题和矛盾看不到抓不准，力量误用了，自己内耗就搞得筋疲力尽，等到真正复辟的时候，反而没有人起来造反了。

我后来几次追问鲁大东，他一推三六五，说他不知道，说都是民兵指挥部搞的。我们在组织解散之后进入革委会，群众的组织渠道没有了，小报没有了，我们与群众的联系渠道基本上中断了，在革委会内部群众代表仅仅时一个花瓶，根本起不到监督作用，一些干部越监督他们就越发对立；我们确实难以为群众落实一些起码的要求，隔阂就这样随着时间流逝而加大。本来这一次在处理“十大宣传队”的事情上，如果按照我们的设想，是个跟群众见面、增加联系的机会，至少可以消除一些误会。鲁大东的高招加深了我们和群众之间的隔阂甚至是仇恨，他一方面宣布说是按照黄廉周家瑜的意见处理的，一方面又动用民兵去执行，民兵的名义负责人李木森、陈万明也是造反派头头。“十大宣传队”的头头王汉东，原来是我最好的朋友，他确实是在文革期间受压最深，我和周家瑜不是不想帮助他，但是在革委会里面我们确实什么也没有做成。在鲁大东这样的老政客和玩政治手腕的高手跟前，我们当然只有“栽跟头”的份了。

毛主席发动文革的各种设想和战略部署，无法真正落实，走资派拼命抵制和破坏，仅仅依靠当时造反派群众的认识水平，以及造反派头头象我和周家瑜所具有的斗争经验，是远远不够应付的。我们在上面难以冲破当权派严密的组织体系，去监督走资派的各种花样和反攻倒算，下面难以回应群众的合理要求，甚至在“倒旗”之后还逐步失去了与群众的有机联系。十年文革期间，文革的积极分子如我，在走资派刻意安排的一波又一波的构陷和打击之下，我们自己最后也成了要为自己生存而奋力挣扎的孤立个人，而不是一股力量，因此文革的最后失败就有其必然性。

造反派很多人都是朴实的工人农民、单纯的学生，没有政治斗争检验，更缺乏领导经验，我也同样如此。在很多问题上不会把握自己，不善于团结和合作，缺乏长远的政治眼光和头脑，我自己也只是勉强做到从做一个稳重的人角度去处理问题。派性问题上我也缺乏足够的认识高度去做别人的思想工作，至少是没有能够团结立场和利益一致的人。重庆大武斗死了那么多人，估计有上千人，反到底这一边的人都是死无葬身之地，八一五派在沙坪坝有他们的烈士陵园。解放军进军大西南的时候，在沙坪坝公园埋了几个烈士墓，八一五的人利用当时军队支持他们的有利形势，把各个单位死者的骨灰都移到那里安葬。在当时反到底很多人战死之后，多是就地掩埋，在体育馆被打死的彭韧，就是埋在花坛底下，嘉陵江大桥的死者也是埋在桥头花园，虽然长安厂修了一个烈士塔，造反军南岸城建兵团战死的人埋在南山和汪山，都是他们自己去地方埋，后来强迫取出来迁移走，市中区不容许我们有反到底的陵园，埋在市区的不合法，要不就威胁要取出来扔掉。文革结束之后这个问题反而更突出，为这个事情反到底有很多人来找过我，要作为一个问题来解决。我说人都死了，强迫迁移也要顾大局，厂区闹市区可以理解。从文革的全局出发，不要再去为死者的家属增添新的痛苦。如果当权派或者军队干部高明一点，当初本不该留下这样明显的差别和裂痕，一派有烈士陵园这个事情，正好留下当权派支一派压一派、在群众组织内部搞分化瓦解的明显证据，这留给后人去思考，有什么不好呢？今年春节的时候，邓长春去世了，当时约周家瑜一起去邓长春家里，结果周家瑜没有去，最后是去了八一五的陵园，邓长春是反到底的武斗总指挥，含意很明显。我们有些人就对他有看法，我说难道还要在死人身上搞派性吗？周家瑜今天还是我们的主要矛盾吗？时间已经过去了几十年，面对当今的社会演变，不但我们整个重庆的造反派群体要深思，就是整个无产阶级都要深思，为什么搞资本主义复辟那么容易？我们工人为什么总是团结不起来？为什么我们的那一点私心，就被人充分利用并成功地分化和瓦解了我们的队伍。

二十、出席四届人大

1970夏天，我在市革委会落实政策办公室工作，因为回家不方便，安排住在工交政治部的楼脚下。有一天半夜，鲁大东来敲我的门，要我准备一份简历，说明天交上来要报到北京去。第二天上班时周家瑜跟我见面，问鲁大东跟我说了什么，我说没有什么。他说周总理来了

电话，准备叫我们出席四届人大，我说代表是选嘛，咋个定呢。周家喻说他早就知道了，是梁兴初司令员告诉他的。

隔了两个月的样子，鲁大东对我说，你明天回木材公司去参加小组会，你没有政治斗争经验，大家可能要提些意见，这是讨论通过你的人大代表资格问题，一定要记住不要反驳。回去后，两派的群众都没有什么意见，喊我自己讲一下。13军政委何云峰是军代表，还算是讲原则的，让我们看了市革委会的简报，我这才知道已经把48个人大代表人选，全部下发到基层去讨论了很长时间。车队的刘司机告诉我，鲁大东说把这个老别克车子调给我，我说不要专车，司机说在四届人大后会你可能要去市人委，我这才知道党政机构要分家了，要规范化了。我名义上是重庆市革委会副主任，但是一切正常的信息渠道完全被鲁大东他们封锁了，每一次参加会议我都能感受到与军队干部、老干部之间的隔阂和距离，反倒要靠小车司机传播一些重要信息给我。后来四届人大长期不开，我就知道中央上层的情况很复杂，也还不是很稳定。

1974年开始批林批孔，这一年大量解放干部。直到1975年四届人大才召开，突然通知我到重庆宾馆集中，全市48个人大代表一道去北京。岳林说你们年轻，路上当个义务服务员，安排我和周家喻照顾一下老同志，他安排周家喻照顾裴昌会，我要求换过来，过去当权派说此人给我当“黑高参”，我要借此机会认识一下。岳林同意了，说我给你们介绍：裴老，他们说你是黄廉的高参，这就是黄廉同志，你们原来见过吗？我说从前没有见过，今天算是幸会。裴昌会说要真能当也是个荣幸，很遗憾是假的，要喊我打嘉陵江大桥，我还真不知道咋个打法。当权派1967年就放出谣言，说裴昌会帮助我们指挥武斗，发武器，策划武斗方略，打下嘉陵江大桥之后还和我一起下棋。我说：原来以为是你乱讲的，他说你就是这样小看我？他后来在火车上告诉我，那些专案人员完全不讲政策，乱整，把我脚杆都打断了，说得老泪纵横。我说这一路我陪着你行不，他说今生有缘相遇，难得。当时他已经是八九十岁的高龄了，还是腰板笔直，他说自己的身子骨还能够熬几年，上下台阶连手都不让我扶一下。我亲眼看到这一位满头银发的老人，亲口诉说自己脚杆被打断的往事，回想到走资派硬把他和我们反到底扯在一起，捏造事实设立专案，陷害了成千上万的反到底群众和干部，心绪难平。

人大开会之前，四川代表团开了支部会议，李大章主持会议，说共产党员要保证开好会，要听毛主席的话，不准串联，审查各种文件的时候，要做好工作，以团结为重，共产党员不要做对不起党的事情。我当时不是党员，李大章单独找我说，一定要遵守纪律，小组讨论的时候，讲话要有理有节，要发扬民主作风，你是代表四川人民来的，就应该代表四川人民把会开好，不要自由主义，你要理解中央领导提名你参加此次会议的重要性和严肃性，既然你有你的代表性，你就应该对得起四川人民，对得起中央领导对你的关心。四川代表团报到之后，有个原本在受审查的老人家突然宣布解脱，还参加此次人大，他高兴得死了，政治生命对他竟然是如此重要。

我去湖北代表团找朱鸿霞，通过他去找过夏菊花，回来之后李大章追问我去找朱鸿霞的事情，说不要搞派性，我说是通过他去找武汉百万雄师的人，夏菊花不是我的同派。我还戏谑的告诉他，我看见程子华去天津代表团找过解学恭了。

会议开始之后，就发下文件和宪法草案来讨论。周家喻问我对宪法有什么看法，我说这是建国以来最好的一部宪法，草案只有四页纸，又简单又明了。李大章问我最感兴趣的是那一条，我说是四大写进了宪法，李大章反难道毛泽东思想写进去了就不重要吗？我说毛泽东思想写进去同样很重要，但是过去的文件不是都写了吗？从王明开始，党内历来有人反对毛泽东思想，出了多次反动路线，关键是没有具体的群众监督权力和措施，如果群众可以去市委贴大字报，那就不一样了。问其次感兴趣的地方，我说还有文革写进去了也很好，如果有人敢搞修正主义，我们的子孙就可以利用这个武器，世世代代都敢造反，发扬民主不是一个空洞的名词，而是要

给人民以实际的行动权利，还给了方法。第二天就要我到大组去讲。

在讨论人事问题的时候，有人说王洪文要当委员长，造反派就有人说他是个公子哥儿，李大章问为什么是这个评价，我说他在党内搞了几年没有干什么事情，李大章说王洪文只能学不能比。在正式的大会上，我坐在姓黄的代表那一坨，我看到票上有李井泉的名字，我拿起笔打了个叉叉，有个将军叫黄成连看见了就问：你是四川的？回来之后就找我谈话，周秘书说你只打算当这一届代表。

会议期间，我和周家喻在一起私下里议论，看台上第一排坐的都还可以工作，后面的全是一些老人，康生坐在那里口水往下掉，服务员过去帮他擦了两回；邓颖超路都走不动了，徐海东将军也不行了，是拿车子推上去的。我说中国不解决接班人问题怎么得了？中华民族确实需要一场大改革。

大会开完之后，朱德和江青同时来四川代表团看我们，我就坐在第一排首长座的对面。朱德进来之后，看上去就像是个棉捆子，外面是一层皮的，里面是呢子的，再裹上毯子，就在我面前一层层地脱下来，然后就座。朱总司令这个时候的身体已经非常差，两眼都不灵活了。我们欢迎总司令讲话，他首先问是四川的代表吗，然后就说我们是老乡，你们要团结，不要分裂等等，最后说要提倡艰苦奋斗精神，要节约，不要说钱没有用了，都拿来都吃光不好，要节约，把钱存在银行里。说完之后，服务人员又把他原样包起，两个人扶着出去上车，身体都这么差了，应该好好休息才是，出来对他是一种折磨。

江青进入接见会场之后，由李大章介绍，一一与我们握手，我就问主席身体好吗？她说还好还好。江青在讲话时，说主席很关心四川，当前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要通过革命的大批判，发动群众去逐步解决，要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要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还讲到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要培养接班人等等，大概讲了二十来分钟。

会议结束那天，去餐厅吃饭的时候，我刚巧跟江华一桌。他的穿着十分朴素，气色也不好，他说自己被关过牛棚。我问他到底是不是走资派，他说我自己不想走资，还是想跟毛主席走。我说那冤枉你了，他回答说毛主席说了要理解嘛。我又问他参加过长征没有，他说当过省委书记的，恐怕还是要长征过才行咯。一会儿孙健来了，我说听说你是个造反派，他说有幸生长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嘛，我是毛主席教育成长起来的造反派，孙健是天津的，我提到万晓塘，他说在江院长跟前谈资反路线，他会有意见，江华说不干事，人人都有说话的权利，想谈什么都可以。

会议结束后，在京西宾馆我去与朱鸿霞告别，他告诉我昨晚李先念跟他谈了，说了些又是批评又是表扬的话，要他回去之后还是继续回下放的大悟县宣化店公社蹲点。朱说很难工作，省革委会只是有事情才把我们喊去，群众要我们发挥一定的作用，自己面对着那些老干部是无能为力。他说自己倒是愿意继续去跟农民在一起，农民比干部好相处得多，他相信能把蹲点的工作搞好。

我们一回四川，周秘书来机场接我们，李大章见了我说：你们几个又想在人大会上“放卫星”是不是？走的时候又去找了谢文欣是不是？一屎不臭，挑起来臭，你们回去之后把大批判工作做好，多跟鲁大东商量。

原来我想在四届人大之后，会有一番新的景象，新宪法那么好；回去只在大礼堂开了一次传达大会就了事，没有任何相应的措施和改进。不要说执行上面有上面有新的起色，连会议精神都没有传达到基层去，重庆市党政机构的工作模式还是一切照旧。

(未完待续)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 0 2 1 - 8 6 0 2

投稿专用地址: hwx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 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 获取

中文文件: hwxz-info@cnd.org 英文文件: 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 <http://www.cnd.org/>
